

<< “新启蒙” 知识档案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 “新启蒙” 知识档案 >>

13位ISBN编号：9787301169445

10位ISBN编号：7301169442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地点：北京大学

作者：贺桂梅

页数：387

字数：39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新启蒙” 知识档案 >>

内容概要

作为“新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被视为告别50—70年代的革命实践而进行文化“新启蒙”的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形成的文学观念、知识体制与思维模式构成了近三十年的新主流文化，也是人们理解当代中国六十年乃至整个20世纪历史的基本认知装置。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使得如何评价这一认知装置变成了知识界的关键分歧所在。

本书从探讨人道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寻根”思潮、“文化热”、“重写文学史”思潮、“纯文学”实践等6个文学与文化思潮着手，试图对80年代整体思想状况进行一番知识社会学考察。

对每一思潮，不仅在新的历史视野中重构其基本历史轮廓和复杂脉络，更从叙事形态、知识构成与话语机制等不同层面重新解读其核心历史文本，尤其关注“知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

这种研究的两个基本特色：一是跨学科视野，以文学文本为主，但扩大到美学、哲学、理论、历史研究等领域，力图把80年代思潮作为具有“共振性”的文化场域来加以把握；另一则是全球视野与中国问题的结合，从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整体历史视野中揭示出80年代中国文化实践的不同面向，及其与90年代以来“全球化”现实间的关联。

由此，本书希望在批判性地反思历史的基础上，重新描画80年代文化地图，以作为推进现实思考的参照。

作者简介

贺桂梅，1970年生于湖北。

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曾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

2000年留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2004年被聘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20世纪文学、思想研究。

已出版著述《批评的增长与危机——9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1999)、《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2003)、《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2005)、《历史与现实之间》(2008)，另参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导读》(钱理群主编，2002)、《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温儒敏主编，2005)等；并在国家核心刊物发表相关研究领域论文多篇。

<< “新启蒙” 知识档案 >>

书籍目录

绪论 重新定位80年代·中国·文化 一、80年代研究的历史视角与知识社会学 二、“新时期”意识的由来：一组意识形态框架 三、全球视野中的70—80年代转折与中国 四、“文化”与“现代化”：“五四”传统与“现代化范式” 五、80年代人文思潮的知识谱系考察 第一章“回到19世纪”——人道主义思潮 一、引论：人道主义、“五四”与“19世纪的幽灵” 二、青年马克思或黑格尔：“异化”论与历史叙事 三、“人性论”、家国书写和19世纪浪漫派文学 四、康德的阴影下：主体论、美学和革命 五、作为话语事件的“文学主体性”论争 结语：19世纪、知识分子与第三世界革命 第二章“现代派”与先锋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一、作为冷战禁忌的“现代派” 二、“黄(灰)皮书”、“地下文学”与同步的60年代 三、“欠发达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主体的悖论 四、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 结语：第三世界先锋派的主体性 第三章“跨越文化断裂带”——“寻根”思潮 一、寻根思潮：一个简单的轮廓 二、“寻根”意识的发生：“乡村”与“中国”的耦合 三、序曲或语境：“废墟”侧旁的民族想象 四、“活的传统”：寻找“非规范”文化 五、知识谱系：美学、考古与民族史叙事 六、文本：话语冲突的场域 结语：民族主义话语的冲突与耦合 第四章 现代化叙事与“韦伯的幽灵”——“文化热” 一、三个知识群体和三种思想动向 二、三个文本与三个“故事” 三、文化热、“五四”传统与“现代化理论” 四、“韦伯的幽灵”：文化主义及其变形 结语：超越80年代文化意识 第五章 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思潮 一、80年代文化场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 二、“文学”与文化政治 三、“20世纪”与现代化叙事 四、“中国”与全球化想象 五、编史学上的“现代化范式”及其全球语境 六、现代文学学科：新体制、新学人、新范式 结语：“80年代学术的一个象征” 第六章“纯文学”的知识谱系——文学的去/再政治化实践 一、引论：“文学性”如何作为问题 二、美学谱系：“诗化哲学” 三、文学理论谱系：转向语言 四、现代文学经典谱系：“重写文学史” 结语：“纯文学”的自我批判 结语 重建批判知识与批判主体 一、“新时期”与50—70年代、新启蒙范式与第三世界批评 二、“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思想 三、创造新的批判语言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 “新启蒙” 知识档案 >>

章节摘录

对“文革”的定性，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经历过一个变化的过程。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其“反革命”性质被确定为“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

这和毛泽东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描述为批判蜕变为特权阶级的官僚阶层与“资产阶级走资派”，是一致的政治判断。

1976年后，对于“四人帮”，华国锋等“凡是派”延续了对林彪集团的说法，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右的路线”。

不过有意味的是，这种定性在“改革派”那里开始发生了变化。

1978年的重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称“四人帮”“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其性质也开始变为“极左路线”。

另外的文章开始提出“民主和法制”问题，并把对“四人帮”的定性与“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们从‘四人帮’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主义的阴魂。

”“文革”十年被视为“专制主义、帝王思想、皇权思想、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宗法思想、蒙昧主义”等“封建主义的遗毒恶性发展，重新泛滥”的时期。

1981年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基本延续了上述对于“文革”的定性。

正是以这种关于“文革”的论述方式为依据，“思想解放”开始成为一个有力的口号，对“文革”历史的批判和反省也与“反封建”主题有了直接联系。

从“修正主义极右路线”到“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定性，事实上不仅仅是对于“文革”的历史定位，同时也相应地决定了“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及其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

如同韩少功分析到的：“这里有一个知识和话语的转换过程。

一旦确定了‘封建主义’这个核心概念，人们很容易把新时期的改革想象成欧洲18世纪以后的启蒙运动，想象成‘五四’前后的反封建斗争。

后记

交出书稿，有一份轻松、一份惶惑，也忽然生出了些许的疲惫。轻松和惶惑是每当完成一项课题或一篇论文时常有的心态，疲惫感却是自己十余年学术研究生涯中第一次体验到。

这或许因为完成这份书稿的时间是如此漫长的缘故。

关于自己怎么开始从事80年代文化研究，的确说来话长。

十几年前，也就是我还是博士研究生的1998年，我选定80年代文学与文化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研究的对象。

那时，80年代并不像现在这样是一个热点话题，倒正好是50-70年代文学研究热潮刚刚兴起的时间。而我则因为突然对思想史发生了兴趣，于是自以为选定了一个很能够把自己所学的文学专业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的题目：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

接下来我便一头扎进了“五四运动”和“五四”接受史的文学、思想史料的阅读中。

研究基础的薄弱和理论储备的不足，使我完全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问题的关键所在。

结果，一年多时间之后完成的博士论文，在我自己看来只能算是一篇“消化不良”的半成品。

我基本上陷入了用“五四”来评价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思路中，论文大致也就成了关于“80年代为何与如何是第二个五四时代”的详细论证。

尽管这篇论文也受到了师长们的一些好评，而且有过几次可以出版的机会，不过我自己一直认为我应该将它推翻重新做过。

那时还没有完全领略学术研究甘苦的我，年轻气盛而且总想着来日方长，完全没想到这个课题的真正完成要在十年以后。

<< “新启蒙” 知识档案 >>

编辑推荐

《"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培文书系.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